

抑神、崇礼与战争

——试析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文化内涵

杜博瑞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 摘要

东周时期是社会剧烈转型与变革的时期, 赵国作为三晋地区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其物质遗存及纹饰的变化无不蕴含着东周时期社会的影子。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 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发展经历了由抽象到写实、由繁缛到简练的演变过程, 并且纹饰在青铜器上的装饰位置与纹饰组合存在一定的选择性。纹饰的特征与组合变化, 表现出抑神、崇礼与战争的文化内涵。

◎ 关键词

东周赵国 铜器纹饰 抑神 崇礼

◎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青启计划”项目“两周时期社会与思想变迁研究——个案的视角”(2024QQJH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东周时期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时期, 其变革不是单一阶层、某一政策或一种制度的变更, 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大变动。^[1]东周赵国脱胎于晋国, 处于社会大变革与转型时期, 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必然有东周时期社会的影子。

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纹饰的变化不仅对研究审美观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2]因而针对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研究, 有助于从国别视角审视纹饰的发展及其诸多内涵。目前, 针对铜器纹

饰发展脉络^[3]和地域风格^[4]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 但未有专门针对国别铜器纹饰的梳理。因此, 本文尝试从国别视角出发, 通过对纹饰艺术风格、装饰位置、纹饰组合等方面的分析, 揭示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文化内涵。

一、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艺术特征与演变

东周赵国青铜器在长治、邯郸等17个地点发现400余件^[5], 器类主要有鼎、鬲、甗、簠、铺、豆、簠、敦、盘、

鉴、匜、罐、盃、铉、罍、壶、炭盘、鍑18类; 器类纹饰主要为蟠螭纹、蟠虺纹、夔龙纹、兽面纹、云雷纹、垂叶纹、绚索纹、画像纹等。既有分期已经表明, 东周赵国青铜器可分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晚期三大阶段^[6],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器物纹饰归为动物、植物、几何四个大类分别进行分析。^[7]

(一) 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主要为画像纹, 题材分为狩猎与宴乐祭祀两类, 艺术特征演变如下。

狩猎纹在战国早期主要见于长治

一带,题材主要表现人群打猎场景,人物线条简练。刻画人物持矛、戈、盾、弓等武器,围堵、狩猎、追逐鸟、鱼、鹿等动物。(图1-1)

宴乐祭祀纹在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一带,题材主要表现室外宴乐祭祀。以太原金胜村M251:540为例,人物纹饰分两层:上层纹饰中心置案几,放置壶、箭以及支架等物品,两边人群以案几为中心,对称进行射礼投壶、举禾苗祭祀;下层纹饰总体上为人群两两相对,中心置支架,人群举禾苗祭祀。(图1-2)

战国中晚期的宴乐祭祀纹主要见于长治一带,题材主要表现室内祭祀宴乐。以长治分水岭M12为例,纹饰分两层,人物皆处于室内:上层纹饰中心置案几以及祭祀器具,两旁人物反向对称,皆持物与动物舞蹈;下层纹饰边缘人物持武器跪拜,中心人物亦持物与动物舞蹈。房屋外围人物持戈站立,房顶上有鸟兽等动物。(图1-3)

综合来看,东周赵国青铜器人物纹饰的题材特征经历了由狩猎向礼仪的演化。

(二)动物纹饰

动物纹饰包含蟠螭纹、蟠虺纹、蟠龙纹、夔龙纹以及兽面纹等,艺术风格演变如下。

1.蟠螭纹

相互缠绕无角的龙为蟠螭^[9],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金胜村一带,纹饰缠绕呈“S”形。小龙顾首,颈部饰云雷纹,颈、腹部相互缠绕,尾部卷曲呈“S”形,或小幅卷尾。(图2-1)

战国中晚期,蟠螭纹主要见于长治分水岭一带,纹饰缠绕呈“C”形。小龙顾首,腹部相互缠绕;头部与尾部几乎相连,或腹部弯折、尾部呈“S”形卷曲。(图2-2)

2.蟠虺纹

蟠虺纹,基本形态为首尾皆有口的小蛇相互缠绕^[9],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邯郸一带,纹饰缠绕细密,两对双头小蛇交错缠绕形成四瓣花形方块。(图2-3)

战国中晚期,蟠虺纹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纹饰缠绕松散,两条双头小蛇相互缠绕成松散方块。(图2-4)

3.蟠龙纹

蟠龙纹与蟠螭纹相区别,由相互缠绕的带角龙纹组成,主要特点为龙的腹部、尾部皆相互缠绕。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蟠龙纹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纹饰龙身粗壮,龙尾弯折;龙身饰卷云纹、圆涡纹、云雷纹等纹饰。(图2-5)

中晚期,蟠龙纹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纹饰龙身较细,龙尾卷曲,被张开的龙口咬住;龙身饰云雷纹。(图2-6)

4.夔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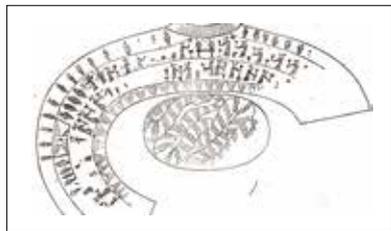
夔龙纹与蟠龙纹一样,皆由龙形纹饰组成,唯一区别为夔龙纹是单一个体,其上夔龙互不缠绕。纹饰艺术风格分为简化和写实两类,演变如下。

简化夔龙纹,根据夔龙形态又分为“S”形和“C”形两类。其中“S”形夔龙纹特点为龙顾首、卷尾,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纹饰写实,龙圆眼,头部卷曲,龙身饰卷云纹、云雷纹、弦纹等纹饰(图2-7);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纹饰线条简练,龙的头、尾简化,蜷曲(图2-8)。“C”形夔龙纹特点为龙顾首、尾部弯折,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一带,纹饰繁缛,龙头刻画较为细致(图2-9);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龙头刻画较战国早期简化(图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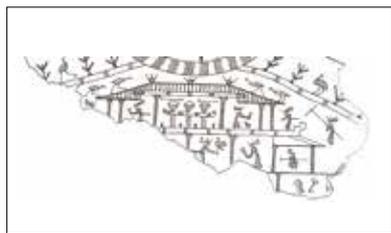
写实夔龙纹,战国早期主要见于



○ 图1-1 长治潞城M7: 156



○ 图1-2 太原市金胜村M251: 540



○ 图1-3 长治分水岭M12

○ 图1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人物纹饰

太原一带,龙纹站立,龙张口,颌首,曲颈,身躯弓起,四脚直立,尾部上翘(图2-11);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龙纹匍匐,龙张口,仰首,曲颈,身躯弯曲,四脚半跪抓地,尾部卷曲呈“S”形(图2-12)。

5.兽面纹

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之一,通常由角、眼、鼻、口以及身、尾、鬃等部位组成,依据其兽面的角部特征划分为羊角、牛角、狐耳三类,演变如下。

羊角兽面纹,主要特点为圆眼、卷胡,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纹饰繁缛。羊角粗壮,鬃勾勒卷云纹;兽面部饰云雷纹与卷云纹,羊角饰鳞纹或弦纹(图2-13);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简练,兽面部饰



○图2-1 太原市金胜村M6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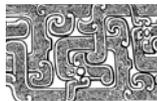
○图2-2 长治分水岭M26:1



○图2-3 太原市金胜村M251:563



○图2-4 长治分水岭M26:12



○图2-5 太原市金胜村M673



○图2-6 长治分水岭M25:26



○图2-7 太原市金胜村M251:587



○图2-8 长治分水岭M12:6-2



○图2-9 太原市金胜村M674



○图2-10 邯郸市百家村M57:43



○图2-11 太原市金胜村M251:561



○图2-12 太原市金胜村M88



○图2-13 太原市金胜村M674



○图2-14 长治分水岭M12:22



○图2-15 太原市金胜村M673



○图2-16 长治分水岭M25:38



○图2-17 长治分水岭M26:1

○图2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动物纹饰

篦点纹,羊角饰弦纹(图2-14)。

牛角兽面纹,由夔龙纹缠绕而成,主要特点为圆眼、眉部上翘、半圆形口鼻,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纹饰繁缛,兽面饰斜三角云雷纹,莼饰倒钩纹(图2-15)。同时,长治一带也有线条简练、兽面饰斜三角云雷纹的类型(图2-16)。

狐耳兽面纹,面部为狐属造型,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眼部呈四边形,眉部上翘,鼻部对称圆涡形,莼部饰篦点与八字纹。(图2-17)

综上,蟠螭纹、蟠虺纹与蟠龙纹皆经历了龙身缠绕由紧密至松散、由复杂到简单的演变,夔龙纹、兽面纹则经历了纹饰特征由细致写实到抽象表达的演变,且躯干的填充纹饰也逐步稀少。总体上看,东周赵国青铜器的

动物形纹饰经历了动物特征刻画由繁到简,动物填充纹饰从有到无的演变过程。

(三) 植物纹饰

植物纹饰主要指垂叶纹,单体形如树叶,向下排列。根据叶片形状划分为桃心形与曲尺形两类,艺术风格演变如下。

1. 桃心形垂叶纹

根据叶片内填充纹饰,桃心形垂叶纹又可划分为叶脉型、兽面型和夔龙型三类。

叶脉型桃心垂叶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叶脉卷曲,纹路卷曲,线条复杂,虚实结合(图3-1);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叶脉简单勾勒,线条简化对称(图3-2)。

兽面型桃心垂叶纹,目前仅在战国早期发现于邯郸地区,兽面纹中的眉、胡卷曲。兽面纹圆眼、菱形口,眉、胡与鼻部呈“S”形对称卷曲;眉眼中心置菱形饰。(图3-3)

夔龙型桃心垂叶纹,主要特点是呈“S”形对称,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线条写实。夔龙纹顾首,对称;眉、眼、口、尾线条丰富,细部特征刻画较为详细(图3-4)。战国中晚期,此类纹饰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写实丰富。夔龙纹反向对称,“S”形较为舒展,圆眼、张口、卷尾;夔龙纹腹部有椭圆形饰将其连接。夔龙纹下接简化兽面纹,夔龙纹尾部置兽面纹眼、眉(图3-5)。

2. 曲尺形垂叶纹

曲尺形垂叶纹,目前仅在战国早

期发现于太原地区。纹饰内填蟠龙纹，曲尺形线条圆滑，两组夔龙相互缠绕，圆眼、张口、顾首、卷尾；尾部呈卷云形。（图3-6）

垂叶纹经历了线条刻画逐渐简化、填充纹饰逐渐消失的过程，但个别类型较为特殊。其中曲尺形垂叶纹仅在战国早期出现，战国中晚期未见。夔龙型桃心形垂叶纹的演化在战国中晚期出现了突变，填充纹饰有仿制曲尺形垂叶纹填充纹饰的可能。

（四）几何纹饰

几何纹饰包含云雷纹、绶索纹、“>”形纹三类，风格演变如下。

1. 云雷纹

云雷纹，线条相互勾连卷曲构成云纹与雷纹，根据勾连卷曲形态又划分为斜三角和卷折两类。

斜三角云雷纹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长治一带，对称“S”形勾连，勾连云雷纹两两相对，云雷纹尾部存“S”形折线将其相连（图4-1）；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云雷纹头部对称，勾连云雷纹头部对称，纹饰繁缛，对称头部增置半月形纹饰（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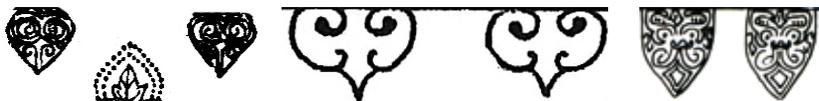
卷折云雷纹呈“S”形对称，战国早期主要见于邯郸一带，线条简练，卷折较少，云雷纹互相对称，卷折一周（图4-3）；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原平一带，卷折较多，云雷纹互相对称，卷折两周（图4-4）。

2. 绶索纹

绶索纹，由线条相互缠绕构成，形似绳索，战国早期主要出土于太原一带，线条较粗，内填纹饰，两条粗绳纹相互缠绕，内填勾连云雷纹（图4-5）；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细疏，一条弦纹横贯其间，两边呈交错叶脉纹（图4-6）。

3. “>”形纹

“>”形纹，由“>”形纹饰组成纹



○ 图3-1 邯郸市百家村M3: 16 ○ 图3-2 长治分水岭M12: 15 ○ 图3-3 邯郸市涉县97SLM01: 2



○ 图3-4 长治市长子县M7: 63 ○ 图3-5 长治分水岭M26: 1 ○ 图3-6 太原市金胜村M674

○ 图3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植物纹饰



○ 图4-1 长治市长子县M7: 63 ○ 图4-2 长治分水岭M12: 15 ○ 图4-3 邯郸市涉县97SLM01: 2



○ 图4-4 原平M3: 2 ○ 图4-5 太原市金胜村M674



○ 图4-6 长治分水岭M26: 13 ○ 图4-7 太原市金胜村M674



○ 图4-8 长治分水岭M229: 8

○ 图4 各地所见东周赵国青铜器几何纹饰

饰带，战国早期主要见于太原一带，呈单一“>”形，按一定方向排列，箭头头部增绘有卷云纹（图4-7）；战国中晚期主要见于长治一带，线条细密繁缛，纹饰中部有实心三角形纹饰，边缘与“S”形勾连云雷纹相连（图4-8）。

综上，几何形纹饰经历了线条由僵硬逐渐转为灵动、题材逐渐丰富的演变过程。其间虽然纹饰线条出现了简化、填充纹饰逐渐消失，但线条的表现力更强，充满灵动。

通过对纹饰风格演变分析，可见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发展的主要特点为动物纹饰的衰落与写实性和几何纹饰的崛起。其中，兽面纹等动物纹饰的线条勾勒逐渐抽象、简练，而人物、植物、几何纹饰的题材逐渐丰富。

二、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装饰位置

有学者根据殷墟青铜器提出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概念^[10]，其核心是纹饰的装饰位置差异。纹饰的装饰位置是指不同种类的纹饰在青铜器上的装饰部位。装饰部位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纹饰的重要性与纹饰观念。对于青铜器的观者而言，青铜容器腹部的中心为首先观看的位置，其次为上、下部，器盖、耳部、足部则为附属位置，具体分析如下。（图5）

主要位置的装饰包含人物、动物、植物与几何纹饰几类。其中人物纹饰位于器物内壁，通常器物内壁满饰画像纹。动物纹饰中蟠螭纹、蟠虺纹与蟠龙纹一般饰于铜器腹部。几何纹饰



○ 图5 青铜器纹饰位置示意图(图中文物为战国环钮蟠螭纹铜盖鼎), 图片来源: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文物精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图版64

中的宽带纹通常饰于器物腹部, 且为满饰; 云雷纹有时作为主纹饰的填充, 满布器物表面。

次要位置的装饰包含动物、植物与几何纹饰几类。动物纹饰中蟠螭纹、蟠虺纹与蟠龙纹有时饰于器盖盖面。夔龙纹一般饰于青铜器口沿下或者盖沿、圈足。植物纹饰中垂叶纹一般饰于盖沿、下腹部与圈足。几何纹饰则通常饰于器物盖沿、口沿下、腹部边沿等位置。

附属位置的装饰包含动物、几何纹饰。动物纹饰中兽面纹主要饰于附耳以及足跟部, 其他部位基本不见。几何纹饰有时饰于器盖等附属位置。

综上, 该时期蟠螭纹、蟠龙纹等相互缠绕的动物纹饰占据了铜器装饰的主流, 兽面纹转变为附属纹饰。此外, 人物纹饰、几何纹饰等特殊纹饰也开始占据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

三、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组合与搭配

纹饰的组合是指不同类型纹饰的搭配方案, 即何种纹饰可以共处同一

件器物。下文将按照炊食器、盛食器、水器、酒器、杂器几类进行分析。

(一) 炊食器

炊食器包含鼎、鬲和甗三类。其中不同样式鼎的纹饰存在差异: 鬲形鼎纹饰以绶索纹为主, 偶见蟠龙纹与蟠螭纹; 立耳无盖鼎纹饰以蟠龙纹、蟠螭纹或蟠虺纹与几何纹、兽面纹的组合为主, 纹饰之间以几何纹阻隔; 附耳鼎纹饰于春秋晚期多为垂叶纹、蟠螭纹、蟠龙纹的组合, 战国早期开始衰退, 逐渐转为以绶索纹为主流; 附耳矮足鼎纹饰在战国早期以蟠龙纹与蟠螭纹为主流, 战国中晚期出现简化趋势, 以几何纹饰为主, 并开始出现早期的纹饰仿制。鬲的纹饰较为简练, 多为素面, 仅在个别器物上出现了腹部蟠龙纹的装饰。甗的纹饰主要为蟠龙纹、垂叶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 其中蟠龙纹处于纹饰中心位置。

(二) 盛食器

盛食器包含簋、铺、豆、簠、敦五类。其中曲尺形圈足簋在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夔龙纹装饰, 此前为素面; 门形圈足簋纹饰以蟠虺纹、蟠螭纹、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为主。铺的纹饰以蟠龙纹为主, 基本无其他纹饰组

合。矮柄豆纹饰以云雷纹、几何纹与蟠龙纹、蟠螭纹的组合为主; 高柄豆春秋晚期以素面为主, 战国早期开始出现单一绶索纹或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 环耳方座豆纹饰战国早期早段为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 其后转变为单一绶索纹或夔龙纹装饰; 无耳方座豆纹饰以单一蟠龙纹或夔龙纹为主。簠的纹饰以绶索纹或夔龙纹为主。环耳三足敦纹饰在春秋晚期以蟠虺纹与弦纹的组合为主, 战国早期开始转为素面; 器盖同形敦纹饰以垂叶纹与绶索纹的组合为主, 战国晚期转变为单一绶索纹。

(三) 水器

水器包含鉴、盘、匜、罐四类。双环耳鉴春秋晚期早段纹饰为蟠龙纹与绶索纹组合, 其后仅为单一几何纹饰; 兽首环耳鉴纹饰以蟠龙纹、蟠螭纹或蟠虺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为主, 同时耳部饰兽面纹。附耳盘以素面为主, 仅战国中晚期短暂出现以夔龙纹为主的纹饰; 环耳盘春秋晚期以素面为主, 战国早期纹饰出现蟠龙纹与兽面纹组合的情况。匜的纹饰主要为单一画像纹, 装饰于器物内壁。罐皆为素面。

(四) 酒器

酒器包含盃、钶、罍、壶四类。盃的纹饰以垂鳞纹与弦纹的组合为主, 战国中晚期仅见单一绶索纹。钶的纹饰在战国早期以几何纹饰、蟠龙纹与垂叶纹的组合为主, 较为繁缛; 战国中晚期开始以单一蟠虺纹或几何纹饰与写实性纹饰的组合为主。无耳罍纹饰以几何纹饰与蟠龙纹的组合为主; 环耳罍纹饰在春秋晚期为单一纹饰, 战国早期为几何纹饰、垂叶纹与蟠龙纹的相互组合。扁壶纹饰为单一几何纹饰; 莲瓣纹方壶纹饰为蟠虺纹、蟠螭纹、蟠龙纹与垂叶纹和几何纹饰的相互组合; 圆壶纹饰为几何纹饰与蟠龙

纹、蟠螭纹等纹饰相互组合；无盖圆壶纹饰为写实性纹饰。

（五）杂器

杂器包含炭盘、匱两类。炭盘在战国早期为素面，战国中晚期纹饰转变为蟠虺纹、蟠龙纹与几何纹饰的组合。匱皆为素面。

综上，鬲、簋、敦、盘、铺、盃、匱、罐等器物的纹饰组合较为简单，通常为单一几何纹饰，偶见蟠龙纹等；鼎、甗、壶、鉴、钫等器类的纹饰组合多样，其中立耳无盖鼎、附耳鼎、甗和簋等个别器类的纹饰组合尤为繁缛。

四、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文化内涵解读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见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以下三个发展特点：第一，纹饰演变经历了传统动物形纹饰的衰落与人物纹饰等新兴纹饰的兴起；第二，在纹饰装饰位置方面，蟠龙纹、蟠螭纹、夔龙纹等占据主要位置，几何纹饰、人物纹饰等新兴纹饰亦开始占据主要位置；第三，纹饰组合存在器类选择性。具体分述如下。

（一）传统纹饰的衰落

在纹饰演变过程中，传统纹饰衰落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兽面纹退出主流纹饰。兽面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主流纹饰之一，其威严、可怖的形象，不在于这些形象有何威力，而在于这些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11]有学者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形象与世间存在的生物相互关联，这些形象是助理巫覡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反映。^[12]总体上看，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是祭祀鬼神

仪式中通天的载体。

祭祀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东周时期兽面纹的衰落，表明作为政治行为的祭祀开始受到冷遇。有学者认为，周代以后虽然仍存在祭祀，但其社会化的特征逐渐突出，主要作用转变为维护族群的纽带，传统的信仰意义已经淡化。^[14]这表明传统的祭祀目的逐渐被人们淡忘，开始被新的意义所替代，因而作为传统祭祀在通天时所依赖的兽面纹载体，在新意义出现的背景下，也就没有继续作为主流纹饰存在的必要。

此外，兽面纹退出主流纹饰也与社会思潮有关。《论语》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5]孔子的此番言论反映出彼时社会存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潮，故而以兽面纹为代表的传统纹饰在东周时期出现开始衰落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二）新兴纹饰占据主要装饰位置

在装饰位置方面，蟠龙纹、蟠螭纹与蟠虺纹、画像纹等纹饰作为核心位置纹饰，表明东周时期该类纹饰受到了贵族阶级普遍的喜悦。

蟠龙纹、蟠螭纹与蟠虺纹的核心特征为缠绕的小龙和双头小蛇，这与中国古代的龙蛇观念密切相关。龙，《说文解字》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16]《韩非子·说难》记载：“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17]此两段记载表明龙不仅有变幻之威力，更有杀人之可怖。蛇，《韩非子·说林》记载：“虫有虺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齧，遂相杀也。”^[18]《国语·吴语》记载：“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19]这表明蛇具有

攻击性、破坏性的特质。因此，龙与蛇皆具有争斗与杀戮性的特点，这与东周时期列国战争的激烈与残酷不谋而合。

在画像纹中，表现宴饮、祭祀等礼仪和骑射、军事等生活场景的纹饰，与射礼等礼仪规范可相互对照^[20]，表现出一定的礼制性。有学者认为画像纹铜器兴起于吴楚地区，在三晋地区得到迅速传播。^[21]《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22]《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23]吴楚地区的部分事迹表达出其对礼的重视。《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24]因而，画像纹这类展示礼仪题材的流行，也相应展现出时人对礼的重视。

（三）纹饰组合的器类选择性

前文已经明晰，纹饰组合较为多样的器类主要为鼎、甗、鉴、壶、钫等，尤其是立耳无盖鼎、附耳鼎等更为明显。纹饰组合对器物的挑选及其内涵表达具有特殊意义。

有学者曾指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存在器物仿古的现象，主要仿古的器类包括无盖鼎、簋、方座豆、壶、铺等器物。^[25]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立耳无盖鼎、莲瓣纹方壶、莲瓣纹圆壶的形式存在仿古现象，三类器物皆仿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与形制，表明这几类器物具有特殊意义。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除铜钫等个别器类外，这些器类的通高基本

大于40厘米,尺寸偏大,相比与鬲、豆等通高仅10余厘米的器物而言更是如此。有学者认为,东周以来人们对宗庙的兴趣逐渐转移至墓葬,墓上建筑与墓内华丽的装饰表明墓葬已经成为类似“宗庙”的中心。^[26]此类视角表明,尺寸较大器物的作用可能已由商周以来的祭祀天地鬼神转变为一定的展示功能。《史记·赵世家》记载:“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27]这段记载就表明鼎等青铜器是可以拿出把玩、作为比力用器的。同时,秦武王举鼎而死,也表明鼎的重量与尺寸之大。

春秋战国以来,异姓卿大夫的地位逐渐上升,“三家分晋”等事件也表明传统宗法制下权力的衰退,然而东周时期盛行的传统礼制文化仍使新生贵族不得不向其妥协。正因如此,选用代表权力正统性的尺寸较大的器类进行复杂装饰,以此表明自己获得权力的正统性,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礼制潜在的强大约束力。

五、结语

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的艺术风格、装饰位置以及纹饰组合的变化,展现出兽面纹等传统主流纹饰开始被蟠龙纹等以龙、蛇为特点的纹饰替代。战国以来,画像纹也由三晋地区开始迅速传播。在装饰位置方面,传统纹饰的中心位置也被新兴纹饰所取代,且纹饰对所装饰器类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总的来说,东周赵国青铜器纹饰展现出抑神、崇礼与战争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杜博瑞(199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考古学博

士。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与青铜器、青铜艺术史。

注释

- [1] 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 [2]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1、275、343页。
- [3][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 [4] 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第46—50页;武红丽:《东周画像铜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8年;刘静:《战国两汉狩猎图探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
- [5] 杜博瑞:《东周赵国青铜礼容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第10页。
- [6] 张渭莲、段宏振:《论东周赵国青铜器》,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第50—59页;杜博瑞:《东周赵国青铜礼容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
- [7] 弦纹、宽带纹、“S”形纹、垂鳞纹、菱格纹、枝蔓纹等纹样,由于样本基本无变化,在此不另做分析。
- [8] 杜博瑞:《蟠螭纹与蟠虺纹——东周铜器潮流》,《文汇报(理论版)》2019年1月18日。
- [9] 杜博瑞:《蟠螭纹与蟠虺纹——东周铜器潮流》,《文汇报(理论版)》2019年1月18日。
- [10]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载《考古》,2002年第4期,第69—80页。
- [11]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 [12]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第53—68页。
- [13][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67页。
- [14]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 [15][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6页。
- [16][汉]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84页。
- [17][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第94页。

- [18][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八,第189页。
- [19]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0页。
- [20] 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第154页;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 [21] 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载《中原文物》,第46—50页。
- [22][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5页。
- [23][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第1445页。
- [24][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卷十一,第455—456页。
- [25] 张亮、滕铭予:《中原地区东周铜器墓中的仿古器物》,载《文物》,2017年第7期,第65—75页;张闻捷:《战国时代的铜器复古》,载《考古》,2017年第4期,第91—102页。
- [26]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 [27][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第1805页。